

国际问题文丛
INTERNATIONAL
ISSUES SERIES

冷战后 中日安全关系

【德】杜 浩 著
陈来胜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冷战后的中日安全关系

[德]杜浩(R.F.Drife) 著
陈来胜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德)杜浩著;陈来胜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3
书名原文: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ISBN 7-5012-2267-3

I. 冷... II. ①杜...②陈... III. 中日关系-国际
关系史-1989~ IV.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395 号
图字:01-2004-2126 号

冷战后的中日安全关系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经 销
排 版
印 刷
开本印张
版 次
定 价

罗养毅
孙宝旗
王勇刚
张 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www.wap1934.com
新华书店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0½ 印张 252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是德国学者杜浩（R.F.Drife，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政治系教授，长期研究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本书的内容以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为主，但也涉及冷战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本书使用的“安全”概念是广义的。它既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并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及国际关系的诸多方面。作者在本书中率直地谈了他对中日关系中的几乎所有有争议问题的看法，如日本政府不能正确对待侵略罪行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军备问题以及区域合作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读者非常关注的。

在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作者对中国和平崛起还认识偏颇，心存疑虑。显然，作者是受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将占主导地位，日本必须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妥善解决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各种问题。

鉴于作者是一个西方学者，他的立场、观点以及研究方法都有不同于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之处，且在西方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翻译出版此书可为读者研究中日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参考

的视角，了解西方学者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至于此书中的偏颇之处，乃至一些错误观点，相信读者会辨明是非。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7

导 言 /1

后冷战时代的安全 /2

提出的方法和问题 /4

接触政策的复杂性 /7

遏制和顺从 /9

接触政策的驱动力 /11

——来自同盟和三角关系的驱动力

各章概要 /16

第一章 冷战形势下的日中关系 /17

导言 /17

历史问题的影响 /18

对中国的顺从 /22

与美国结盟产生的影响 /25

1972年,关系正常化 /28

70年代反霸权主义时期 /32

中国安全关注的复苏 /37

日本作为一个民生大国参与中国事务 /40

1989年“六·四风波”：对接触政策的检验 /42

结论 /47

第二章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关注的上升 /49

导言 /49

第一部分：中国安全政策的背景 /50

中国与冷战后的环境 /50

日本在中国的“多极世界”中的位置 /55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62

第二部分：日本新近出现的对中国的传统安全关注 /67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67

中国的核威慑和核试验 /70

领土争端 /78

——钓鱼岛/东中国海/南中国海

1995—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 /106

——日本的反应/台湾的战略重要性

第三部分：非传统的安全关注 /118

导言 /118

对占有自然资源的竞争 /119

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 /120

犯罪和移民 /122

对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地位的挑战？ /125

第四部分：国际、国内的变化和日本有关中国的争论 /128

国际、国内的变化 /128

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辩论 /135

——舆论/文献中关于军事威胁的认识

结论 /141

第三章 势力均衡与参与政策之间 /142

导言 /142

第一部分：军事和政治的势力均衡 /143

日本的军事力量结构与中国 /145

1995 年《国家防卫计划大纲》 /148

奈倡议：不提“中国”一词 /151

1996 年日美“联合宣言” /155

日美联合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背景 /158

日中关于日本新安全政策的争论 /162

——日美防卫合作包括台湾在内/1996 年以后关于包括
台湾的解释上的 180 度大转弯/中国对战区导弹防御系
统的反对

对中国的政治势力均衡 /175

——缅甸/越南/印度/俄罗斯和中亚/两个朝鲜

第二部分：政治和经济参与 /190

一、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 /190

导言 /190

双边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 /193

——论坛和议事日程的扩大/日本是中国二等安全伙
伴？/第二轨道对话和第三轨道对话

多边安全对话和交流 /208

——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南中国海/第二轨道和第三轨
道的安全讨论

关于安全对话的评价 /226

二、经济参与 /228

导言 /228

贸易 /231

投资 /233

政府开发援助 /235

多边经济参与 /236

日本和中国的以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导的战略 /237

结论 /239

第四章 接触政策的驱动力 /240

导言 /240

政治和经济参与的公开争议 /241

——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好是坏？/相互依存与影响之
间的脆弱联系

对抗和竞争 /255

——经济对抗/政治—战略的对抗

三角驱动力：来自美国背景下的挑战 /274

——日美的不对称和接触政策/处于三角旋涡中的日本

日本的顺从和克制 /299

结论 /303

结束语 /305

挑战 /310

几种方案 /314

政策建议 /318

导 言

日中安全关系是亚太地区新战略环境形成中最重要的变数之一，不仅有地区的含义，还有全球的含义。对于中国崛起为大国的地位，日本如何应付，这对地区和全球稳定，对进入未来人口最多的市场，将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其结果将与国际体系是否接受并如何接受一个新的大国有重要的关系，这个新的大国前进与发展那样迅速，但是又被许多国内外政策问题所困扰。^①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和罗伯特·S. 罗斯在提到美国面对中国的类似情形时，把这一挑战描述为“如何以这样的方式对一个崛起的大国做出反应：既与其国家短期的、地方观念的民族利益一致，又与其在全球秩序中，特别是没有大国战争时规范的利益相一致”。^②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对中国升到大国地位，对于促进有益于世界体系的结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日本的实质作

① Morton I. Abramowitz, Funabashi Yoichi and Wang Jisi, 'China - Japan - US Managing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998, p.55.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xii.

用主要在于它在地理上邻近中国，在于它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愿意以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帮助中国，还在于它作为美国主要的亚洲同盟伙伴的地位。日美全面关系对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有影响，同时也影响到日本对中国上升到大国地位发生影响的能力。

后冷战时代的安全

安全概念迄今主要是由现实主义者下的定义，他们认为这一概念就是国家，然而内容狭窄，只与军事安全有关。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这种新现实主义的看法日益受到挑战，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安全的含义包含有人类集体（而不仅仅是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生存，还包括军事因素在内受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的生存状态。^① 这些非传统的状态也许不直接导致军事冲突，但是也许造成更有可能发生这种冲突的环境。

在本书中，“安全”主要所指的，仍要理解为国家，但是这里把安全理解为包含国际国内的安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日本关于中国的安全认识的很大部分是由于种种问题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些问题与中国内部稳定方面的民族认同、政治合法性和分配的公正性有关系。许多日本观察家担心，中国可能出现经济和社会失败的后果，也许对日本构成比军事侵略的可能性更加现实的威胁。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仍然是日本和中国的安全的核

^① For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thinking of security see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 1. See also Keith Krause, 'Broadening the Agenda of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s and method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0) 1996, 229 - 54.

价值观，但是获得和（或）保卫“社会地位、尊重、物质所有权和特权”也是安全的核心价值观。意识到另一方为了国家的自我保存而要求国家的自我扩展的程度，这个问题对日本和中国来说更是安全的核心价值观。^①

安全概念中包括经济力量和经济复苏力的历史，在亚洲要比在欧洲或美国久远得多。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使用综合的国家安全概念，中国从其经济开放时采用了这个概念。^② 下面的说法可以说明它与安全有关：

经济力量直接与国家的实力和安全有关；

- 经济福利是重要的国家价值观的一部分，是国家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 在国内和国际，都用经济手段达到国家的重要目的；

- 保护经济发展的物质资源的手段有经济的，也有外交和军事的；

- 在国家和地区/国际层次上，经济发展的影响造成的生态后果。

因此笔者同意阿拉加帕提供的关于安全的一般定义：“对当局决策者认为对社会生存和福祉至关重要的价值观的保卫和增强”。^③

① For a discussion of core values of national survival see Muthiah Alagappa, *op.cit.*, p.39.

② For Japan's concept, see John Chapman, Reinhard Drifte, and Ian Gow, Ian, *Japan's quest f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 defence, diplomacy & dependence*, London/New York: Frances Pinter/St. Martin's Press, 1983.

③ Alagappa, Muthiah, *op.cit.*, p.689.

提出的方法和问题

根据对安全的这种理解，本书分析了1989年以来日本对中国安全的几经变化的认识，以及它如何做出反应。之所以选择1989年，是因为这一年度与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动即冷战结束有关。本书所做的研究包含中国军事政策，但是也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一些问题的影响，这些问题被认为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其范围广泛，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到中国对领土问题（石油开采；保卫海上航线）的反应、两个国家在东亚统治集团（领导权竞争）的地位确定、生态问题以及中国国内稳定等。由于我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的缘故，我注意的焦点是日本的观点（和作为结果而产生的政策），但是我努力将其观点与中国一方所持的观点相对照。

日本像任何其他有关国家一样，不得不应付它自己对中国现在什么样以及将来可能变成什么样的认识，就像应付中国对自己的推测一样。双方这些认识的形成受到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经验、策略的考虑和国内政治等。中国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仍然不是立足于其综合国力上（就实际的经济和军事能力而言），而是立足于它的领导层如何巧妙运用外国列强对其规模、地理位置、资源和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应用这些资源的意图的认识。新近的信息表明，中国想改变其军事、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保持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混合状态，实现领土完整（重新统一台湾，实现领土主权要求），发挥与它认为合法的历史地位相称的地区和全球作用，殖民主义和西方侵略行为曾经把它从这一地位上推下来。在这些修正主义的目标和落实目标的方法中，有些是相当模糊的。支持它们的是一种过时的现实主义，它

导致某些外国评论者谈到“中国威胁”。对日本来说，这些修正主义的目标引起日本自身在亚洲的未来作用和地位的重要问题。

为了影响中国，使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其目标——尽管这个国家推行领土和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尽管它难以使其迅速的经济发展与稳定的国内政治形势和环境可持续性相一致——，日本选择了接触政策。其基础是：给中国提供经济和政治的刺激，通过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和与美国的军事联盟，以军事均衡加以防范。笔者因而不同意用结构现实主义来解释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也不同意那种认为日本接受了“所有现实主义的假设，但是将它们用在经济领域”的主张。^①相反，本书认为，日本不再公开贬低其中国政策的军事成分的重要性，不再在许多双边问题上表现出顺从中国的倾向，而是转到这样一种立场上：军事和经济的中国政策日益同对一种中国政策的期望联系在一起，这种中国政策与日本国家利益和已为国际接受的规则相一致。

中国的领土的和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对日本（及其他有关国家）设法防止一种事态构成挑战，这种事态就是：中国的许多政策表面上积极响应接触政策，但仅仅是暂时的或策略上的顺应，目的是从日本那样的大国的经济支持战略中获得最大利益，直到中国感到很强大，能够以与保持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世界不协调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人们担心，即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取得成功，其社会结构也会出现分裂，或环境遭到破坏，以致这个大国的不稳定，通过难民潮、跨国犯罪、越境污染而威胁邻邦的安全。

接触政策往往与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学派有单方面联系，该

^① For a discussion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see Eric Heginbotham and Richard J. Samuels, 'Mercantile r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 Spring 1998, p.172-3.

学派不能公平对待接触政策实际具有的复杂性。笔者提出了以现实主义和构成主义的构成要素为基础的接触政策的驱动力模式。第一个和第二个构成要素对日本的均势（以其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威慑为基础）及其经济政策（特别是它对中国实行的巨大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作了解释。后一构成要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对中国未全部使用其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资源，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经常表现出顺从。这一模式是个驱动力模式，因为对建立在以上三种理论基础上的政策的严密考察表明，除了地区和国际的环境造成的那些动力以外，还存在固有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动力。因此本书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日本对中国实行的是哪一种接触政策，如何可行，如何可以持续下去。以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动力模式的调查为基础，有可能制定未来日中安全关系的若干方案，提出某些政策性建议。

本书在双边层次（日中）、同盟层次（日美）和多边层次（例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上分析日本对华接触政策。日美的全面结盟决定了日本与中国的安全关系，同时，此同盟又是由于这一安全关系而形成的。日本和美国双方都表示要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它们相互依赖，程度不同地做着这件事。本书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日美实力、利益、政策手段的不对称，以及两国国内环境的差异，对它们的接触政策的影响。这些利益和政策手段能否和睦相处？如果能够和睦相处，它们是否适当？

日本对中国实行的地区和多边的接触政策，由于历史短暂，至今尚未有完备的文献资料。然而搞清楚日本以多边斡旋来补充它对中国的安全挑战采取双边的和同盟的斡旋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形成多边斡旋的条件是什么，这是重要的，其结果不仅与公开声称的目标——使中国成为和平、开放的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利害关系者，提供一种用于牵制和均衡的机制，提出环境退化这种跨国问题——紧密相关，而且还将是对多边主义的未来的严峻考

验，因为中国若不欣然接受，多边主义也就无法生存。

接触政策的复杂性

对接触政策的误解引起相当多的混乱，因为它模糊了接触政策的现实主义的构成要素，即实行均衡和防范的力量作用。为了给缺乏对接触政策的理解提出补救方法，有人提出，限定“接触”的形容词，甚至创造新词，这使得对接触政策的适当理解变得更加困难。关于接触的定义较多，有无条件接触，有条件接触，全面的或建设性的接触，强硬性接触，遏制性接触（con-gagement）^①，强制性接触和约束性接触。^②由此造成的定义混乱必定造成国家层面上寻求接触的困难，更不用说与另一国家的相互合作了。事实上，接触政策十分依赖带有威慑和均势要素的现实主义基础，同样也依赖自由主义基础，它强调积极的力量：增进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普及国际准则，建立调节国家之间和平合作的规则和惯例。

接触政策中均势和威慑的构成要素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学说，即如果有稳定的均势，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但是力量关系的转换

① 这是作者自己杜撰的词，取“遏制（containment）”中的“con”和“接触（engagement）”中的“gement”合并而成。他想说明的是，这是由“遏制”和“接触”组成的政策。他批评了那些各种各样的解释，拒绝制造新词，因为这只表明这些人不了解“接触”的复杂性。他在本书中指出，“接触”使用了属于“遏制”的一些手段（即军事力量，至少作为防范使用的军事力量）。——译者注

② James Shinn (ed) .,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6, p.4. See also Peter Van Ness, 'Alternative US strategies with respect to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Vietna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0 no.2 August 1998, p.159. Zalmay Khalilzad, *Congage China*,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99.

(中国通过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加强而推进之)对于保持和平是特别危险的。对统治的稳定来说系统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这种稳定以及如何适应变化。现实主义将指出,如亚洲那样的多极体系不如单极体系稳定。亚洲的情况被描述为五强均势体系、“渴望竞争”和走向不稳定。^①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和罗伯特·S. 罗斯二人下面对接触政策所下的定义,或许最准确地描述了这一政策的二元性:“使用非强制的方法改善新崛起的大国行为的非现状的构成要素。其目标要保证,这个新崛起的大国适应与地区和全球秩序的和平变化相一致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改善新崛起的大国的行为,不是寻求限制、约束或阻滞新来者的力量,也不是阻止与其巨大实力相称的影响的发展。^②他们附加了四项使接触政策具有效力的条件:

1. 新崛起的大国只有有限的修正主义的目标,与既存大国的利益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2. 既存大国很强大,以至可以混合使用迁就和确实有效的威胁的办法,即胡萝卜和大棒的政策;
3. 接触是用作补充的,而不是可替代均衡的解决办法;
4. 既存大国在其生存中必须遵循它们要求新崛起的大国执行的同样原则。^③

仔细审视一下这个说法,关于崛起的大国有一点很清楚,在关于既存大国的周密分析中,仍必须考虑到“强制性办法”,尽管其目标是不使用“强制性办法”。这不仅同——与崛起的大国可以想象得到的意图相对的——既存大国的现实主义目标(即均

① Dobb, Friedberg and Betts cited in Muthiah Alagappa, op.cit., p.5.

② Johnston/Ross, op.cit., xiv - xv.

③ Johnston/Ross, op.cit., 14 - 15.